

怎樣獲得和平

陶希聖

在三年前，自己為日本評論寫過一篇論文。在這論文的開頭，我引用了史記中的兩個故事。一個是陳勝，吳廣起兵的時候，他們說：「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死等，死國可乎。」（史記陳涉世家）另一個是韓信以背水陣同趙作戰的時候，他這樣說：「陷之死地而後生。」（史記淮陰侯列傳）在這論文的結尾，我又引了「莊子刺虎」的故事，他說：「兩虎相鬥，大者傷，小者死。」這論文是表現了當時的中國人的心理。中國人不能戰，然中國不戰，則歸於滅亡。故不辭一戰。然而戰了的結果就不免小者死而大者傷的。

當時，中國的知識階級，正在爭論着岳飛與秦檜的是非。他們把秦檜作為和平論者，岳飛作為主戰論者。當時我的見解，反對不戰，然也反對濫戰（濫戰）。自己的見解是備戰而避戰。我並不同情秦檜，亦不同情賈似道。還是同情於葉適。葉適是主張充實國防而反對濫戰的。當時，我正執筆於中國政治思想的第四冊，從宋代到明朝的一個部分，在南宋的學者間，自己是最推許葉適的一派，那是從我自己心裏所表現的。

今日，中國的抗戰，已進至第三個年頭了。「小者死，大者傷」的故事，悲痛地演出於東亞兩大民族之間。在中國的知識階級之中，除了共產黨，人民陣綫（今日人民陣綫已失敗，僅有德蘇戰綫）之外，皆知中國已不能再戰，他們任何一個都知道這戰敗已不能恢復。他們知道外國的援助是不可靠的。何況歐洲大戰爆發，他們更明白外國的援助是不會來了。總之，已知道中國是不能再戰。

從前年的七月七日到南京陷落，南京陷落到徐州失陷，以及武漢，廣東的敗退為止，中國的知識分子，朝夕在盼望着戰爭的終結。

然中國是「八股文」或是「試帖」流行千年之久的國家。在知識階級間具有附和雷同，追隨時尚的習慣。他們所寫的文章，都是千篇一律地呼號着抗戰。然而他們如果閉門自省，那就會深知不可繼續抗戰了。自己是從南京到武漢，從武漢到重慶，從重慶到成都，從成都到昆明，可是到處聽到那些有思想，有見識的知識階級的友人，總是有着這一種切實的認識的。

自己的主張，也不是在一般知識階級的圈外。我是主張和議的。我指摘國外援助的不可靠，我更指摘所謂國際和平陣綫，全是蘇聯欺騙的口實。我又反對共產黨與人民陣綫（德蘇陣綫）的理論。這是說大戰剛像是一個爆竹似的，一旦見到開戰，那末英，法，蘇一定要擊破日，德，意的。可是現在英法同德國開戰了，蘇聯到那裏去了。意大利怎樣？美國又是怎樣？

我借日本評論的一角紙，想來述說一點中國知識階級的心理。中國的知識分子，早已深知不能再戰，知道在中日之間，應該趕快結束戰爭。然而中日之間要獲得和平，依然是一樁困難的事情。

現在已豎起和平運動的旗幟來了。抗戰的「八股」與「試帖」的魔力，既已衰落。迷惑於抗戰的「八股」與「試帖」的人們，已拋棄了「八股」與「試帖」的指導而公然與和平運動攜手了。然而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現在是在四川、雲南、貴州、陝西、不是不想來日軍的占領地域，更是在日軍的占領地域，一面還想去四川、雲南、貴州、陝西的這究竟是怎樣的現象呢？

第一，我們不應該抹殺這種現象。完全抹殺問題，則問題難於解決。譬如解決數學的命題，如果我們不清楚地判別牠，不追究牠而放

任着，那末永久不能解決的，這是同樣的理由。

第二，我們不能輕視這種現象。我們一定會想到知識階級在現實上是沒有力量的。然而應該明知識階級有兩個資格。一是知識分子是人民的一部分。人民所有的觀念知識分子也有的，反之知識分子所有的觀念，會影響人民，會使他們追隨。

在這樣的知識分子的心理，我們一定要知道牠有一個最大的原則存在。這就是民族主義與國家思想。兩年來的戰爭是担負着民族與國家的生命的。他們雖明知戰而大敗，然而仍是接二連三地支持着這個戰爭。他們知道戰敗的結果是不得不和平。然而和平了，能够保持民族與國家的生命麼。這是他們心中的第一個最大疑問，這個第一個疑問，同時也是最終的疑問。

民族國家，必要有獨立的主權與行政。

民族國家，必要有獨立的軍隊與警察。

民族國家一定要有獨立自主的思想與文化。

他們對於領土的完整，當然非常留意。然而他們知道東三省與熱河是不可能收回的。知道是軍事手段，外交手段，都不能收回。他們這種戀戀的心理是可能斷絕的。然而中國本部 (China Proper) 在和平以後，對於主權，行政，軍事，思想文化是獨立自主的麼？

他們受了西洋民族國家的影響。他們知道戰勝國有戰勝國的權利，戰敗國有戰敗國的義務。他們更知道中日兩國進行和平交涉，中國不得不忍受種種的條件。然而他們希望條件是明白的，具體的確定的，是保留中國民族國家的獨立自主的。

這是他們的希望。如果他們對於條件及其實行，一有懷疑的念頭，那末即使想和平，可也不敢主張和議罷。所以他們是陷於矛盾的境遇。他們一方面是明知「戰是不應戰。」而在他方面却考慮着「和也不敢和。」

重慶的國民政府，就是站在這種矛盾的心理上面。日本要想結束

戰爭，想要獲得東亞兩大民族的和平，那末總得先要了解中國知識分子上述的那種心理。在這裏，我自己再分理論方法，事實的三者來說明一下。

一、從理論上說來，那末根據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近衛聲明，日本尊重中國的主權與行政，也不求中國的領土與賠償。依據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汪兆銘先生通電的聲明，那末日本如果撤退在華軍隊，放棄侮蔑中國的思想，那麼這個原則，決不是亡國的條件。所以在理論上，中國可以接受日本的提議，中國在跟日本共同的原則與目標上，可以分担東亞和平的責任。

從中國方面說來，在戰敗了的今日，除了忍受日本以戰勝國的地位所提出來的條件之外，是沒有其他方法的。然而日本不以戰勝國自任，依然是尊重中國的主權，行政，乃至領土。在理論上，中國是可以和平的了，可是中國的知識階級爲什麼還有着疑慮呢？

二、從最後的方法以及事實的兩方面說來，在方法上，日本尊重中國的主權，行政乃至領土的真意，對中國人的心理上的傳達方法不適合。日本方面的某種名詞及其解釋，往往是掩蓋尊重中國的主權，行政乃至領土的真意。譬如「東亞協同體」的一句話，容許有各種的解釋，假使「東亞協同體」如果是說東亞諸獨立國站於平等的地位而互相地求得合作，和平，安全，與發達，那末這句話及其解釋，是不會引起中國人的疑感的。然而這句話一被誤解，如果被指爲中國失却了獨立的地位與平等的資格，那麼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一定是抱着絕大的懷疑的。因爲引起了這種誤解，所以無論如何主張中日兩國今後構成 *Gezellschaf* (集合社會) 或是 *Gemeinschaft* (共同社會) 然不能消滅任何一個中國人的懷疑心理。

中國在今日之下下的情形，與日本講和而合作，那譬如一個窮人跟富人實際合作一樣的。有錢的人往往不懂得窮人的心理，如果在理論上，原則是兩位一體，那麼想來是對窮人方面有利的。然而在窮人

方面說起來，過着獨立的生活，而另外獲得富人的諒解與容認，那是值得感謝，然而不希望加入富者的家族。因為恐怕一入富人的家族，就有化為奴隸的恐怖。剛像是法律學上的所謂「夫婦一體主義」似的，所謂「一體」，是結構的意思，可是在現代的妻子看來，是消失了人格而有變為丈夫的附庸的恐怖一樣。日本如果能够理解中國人的懷疑心理，那麼對於在技術與方法上，如何傳達日本的真意這一點，還希望加以研究。

三、其次是事實。在現在的中國，有主戰與和平的兩大潮流。前面已經說過的，在主戰的潮流之中，對於和平的希望同樣地切迫着的，而主戰潮流存在着的原因之一，就是有了上述似的懷疑心。

在和平的潮流之中，一般相信日本的真意，像在近衛聲明裏指摘似的。然在和平與主戰的潮流之中，任何一個都要獲得「只有事實」證明中國的獨立平等，所以在期待着為和平而並不喪失這些事情的事實的證明。

事實的期待，終於失望麼？或者終於滿足麼？然而事實的發展，如果是中國的主權，行政的獨立以及思想的獨立自主，得以證明為和平而並不喪失這些事情。那麼主戰的潮流，必然會完全消滅。如果中國人對於這一點，可能使渠抱有多少的担心，那麼主戰的潮流，即使結局是消滅的，然而一時間也不容易消滅的罷。

中國人的希望，決不是極大極高。中國人絕不否認日本今後在東亞的優越的地位，日本今後在中國的優越的地位。中國人是希望在「事實」上證明了中國是保持着一個獨立的國家，獨立的民族，以及獨立的思想文化。

獲得了和平之後，中國怕決不會再想與日本戰爭。中國人經過抗戰之後，知道了戰事隨便開始，却不應任意支持。中國今後不得不獲得百年的和平，至少是一代的和平。獲得了和平之後，中國的民族思想，必定會轉脚着地了，變為了尊重科學，崇尚現實的傾向了罷。今後的中國民族思想，決不是受惑於大言壯語，美辭麗句而遭受禍害了罷。

現在的困難，是在於如何獲得和平。如果事實得能證明使中國並不喪失其獨立自主，那麼和平是容易獲得的。否則，中國人依然是夢想着「遠交近攻」，幻想着國外的援助。如此，則中國的社會，政治與經濟，決不能恢復其和平與秩序的。

這許多話，全是中國知識階級的內心的話。我是知道他們的內心是有這一種的思想。所以我自己想率直坦白地對日本人士，把牠寫了下來。

（本文係陶先生為日本權威雜誌「日本評論」的特別寫稿，載十月號內。特譯出以饗國人。——司馬健譯。）

迎 歡

批評，定閱，
介紹，交換。

中日和平與亞洲前途

胡蘭成

對遠東問題，我們認為只有從調整中日關係入手，以調整對英美關係，中日和平要這樣纔能實現，東亞的安定要這樣纔能確立。反之，從調整對英美關係入手以調整中日關係，以國際調停來代替直接交涉，我們是認為不可能的，因為倘若這樣，遠東外交的圓心便無從求得，中日英美四個勢力相引相拒，將無從形成一個交點了。我們的這種外交見解與主張，在歐戰發生前是如此，從歐戰發生到現在也是如此，將來歐戰展開而為世界大戰，還是如此的。

中日戰爭是遠東舊均勢的破壞，但破壞得不徹底，這不僅是因為日本的破壞力有它的限度，而且因為遠東舊均勢是世界舊均勢的一部份，在世界舊均勢的建築物尚未坍塌以前，遠東舊均勢的建築物雖然首先朽爛了，但地面上還是被這種朽爛的殘餘所佔據，新的建築物無從安排起。

可是這個現狀並非不能改變的。就現狀來說，亞洲只是歐洲的尾巴，遠東事件取決於歐洲事件，歐洲出不得主意，亞洲就只好混亂下去。這樣說起來，實在是可悲的。但亞洲為什麼要自安於做歐洲的尾巴呢？從前美洲也是做過歐洲的尾巴的，但上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已知道怎樣把美洲作成一個力量的單位，不再做歐洲的尾巴。怎樣把美洲作成一個力量的單位呢？便是美國的門羅主義，不用以征服美洲諸國家，而用以團結美洲諸國家。上次世界大戰以後，門羅主義展開而為泛美洲主義，整個美洲大體上已做到軍事外交一致，政治經濟合作，成爲一個協同體。這樣之後，美洲雖還不能代替歐洲的世界地位，但已解除對歐洲的依賴。剩下繼續依賴歐洲的，只有非洲，澳洲，亞洲了。

非洲看來似乎是沒有希望的，澳洲的自主則有待亞洲的自主。亞洲有一個中國尚未完全淪爲殖民地，又有一個日本具有成爲亞洲諸勢力的中心的資格。亞洲不能從對歐洲的依賴解放出來，問題就在於中日兩國能否合作把亞洲作成一個力量的單位，像美洲那樣。中日兩國的政治家對於這一點，並不是沒有認識。在中國，有孫先生所倡導和汪先生所遵循的大亞洲主義，在日本，則有所謂東亞協同體。要是亞洲的世界地位，能够做到美洲的世界地位那樣，不但中日和平能够自己料理，整個亞洲的民族自決也可以出現了。

亞洲的經濟依存於歐洲的經濟，因而作成亞洲的政治依賴於歐洲的政治。但這種經濟的依存關係是可以變動的，而且現在已經是在變動了，這從政治關係的變動上可以看得出來。現在只是歐洲的政治環境影響到亞洲的政治環境，但歐洲的政治意志已經不能支配亞洲的政治方向了。政治變動是經濟變動的催生婆，中日兩國要是能够合作替亞洲的政治地位創造出一個新的局面，亞洲的經濟地位也可以得到解放的。

中日兩國合作以復興亞洲，把亞洲作成一個自主的政治單位，經濟單位，這樣，建立遠東新均勢的把握，就在於中日兩國的力量結合，遠東不再是英美之間的緩衝地帶，也不再是夾在日本和英美這三條河流之間的三角洲了。緩衝地帶的存在是人家賦予的，三角洲則隨時會因波流的沖盪而坍塌，消滅。我們現在絕對不能再來希望在緩衝地帶上在三角洲上建立遠東新均勢。人們往往只知道，中日和平的實現有待於遠東新均勢的出現，却沒有知道從實現中日和平當中去建立遠東新均勢。他們盼望英國出來維持遠東舊均勢，又盼望美國出來創

造遠東新均勢，又盼望美國英國與日本共同建立遠東新均勢，而在這種均勢之上取得中日和平。這種盼望，都是在緩衝地帶或三角洲上建立遠東均勢的盼望。他們忘記了把中國這個力量估計在內。他們的盼望都失敗了。

在日本，有着兩種論調。一種論調是看到歐戰起來了，想借重德蘇調停來斷然解決遠東問題，另一種論調是仍然主張借重英美調停來斷然解決遠東問題。其實，德蘇調停或英美調停都是不可能的。德蘇調停之不可能，是因為歐洲的戰局尚在徘徊中，德蘇關係本身現在尚未確定，她們對英美的關係現在也尚未確定，日本又怎能借重這種尚未確定的勢力結合來共同對遠東作斷然的處置？英美調停之不可能，是因為英美在遠東勢力對比之新的確定，現在依然談不到。日本的破壞剝奪了英國的機會，但作成美國的機會還是不夠。美國能否代替英國來領導，以建立遠東新均勢，只有在二次大戰的結果中纔見分曉。現在是日本勝利得不徹底，英國退却得不徹底，美國進展得不徹底，而在二次大戰來到的前夕，這種不徹底的勢力關係是象徵變動的開始，不是象徵變動的結束，英美日之間依照現在的情勢，要想將就妥協，乃是不可能的。

在中國，重慶政府在期待英美蘇援助抗戰制日日本失望之後，轉來期待德蘇調停，又來期待英美調停，而現在則集中於期待美日妥協以作成中日和平。十六日孔祥熙發表談話，不再希望美國制日日本，只希望美國能和日本妥協，其心可說是甚苦的了。然而期待國際調停與期待國際援助，乃是同樣不致有結果的。因為無論是國際援助或國際調停，都需要一個前提，即遠東國際勢力的離合去就已有了一個着落

，一個中心，纔能幹得出事來，可是現在正缺乏着這個前提。

所以，我們認為在日本只有近衛聲明是準確的，在中國，只有汪先生的主張是準確的，近衛聲明與汪先生的主張就是要以中日兩大勢力的平等結合，以之為改建遠東勢力的中心，以之為實現和平的基地。這樣做去，亞洲的世界地位可以提高到美洲的世界地位那樣，不再做歐洲的尾巴，倒是可以做歐戰的監督者。大亞洲主義與所謂東亞協同體，和美國的泛美洲主義有不可以相提並論的地方，也有可以相提並論的地方。可以相提並論的地方就是，美國領導推行泛美洲主義，不是征服美洲諸國，而是團結美洲諸國。日本要是想以征服來代替團結，以征服來代替平等的結合，則大亞洲主義或東亞協同體之實現即為不可得。還有一點是，美國並不拿美洲來對歐洲戰爭，而是拿美洲來調整對歐洲的關係，日本要是以為只有和英美大打一場纔能把外來勢力驅逐出歐洲之外，這會是幹不通的。所以我們的主張，是以中日關係的調整引致對英美關係的調整，不是以中日關係的調整來對抗英美，去和英美決鬥。

我們的這種主張，在歐戰發生的前夕，是要趁歐洲勢力在遠東的退却時機，以促成亞洲的解放；在歐戰發生之後，是要趁歐戰尚未確定，因之尚未能對遠東行使其新的影響的時機，先來確定亞洲的世界地位。將來歐戰展開成爲世界戰爭，我們也只有趕快把亞洲作成一個力量單位，纔能不隨以俱燼。所以中日和平，乃是與亞洲的和平成爲一體的。

X X X X X X X X

蘇土談判停頓以後

吳無吾

土耳其於歐戰炮火爆發前後，對於英法的關係，常要以蘇土關係為轉移。英土法土互助協定之簽訂，在過去土耳其即聲明要以英蘇談判作為前提。英蘇談判既已失敗，歐洲戰爭，遂以爆發。蘇聯為擴張西境領土與勢力，與德國打得火熱，於是巴爾幹半島與土耳其便受到極大的影響。英法在東線攻擊德國的希望，也逐漸消失。為要鞏固近東與東地中海，英法遂加緊其與土耳其簽訂互助協定的要求，更因蘇聯雖與德國瓜分波蘭，但尙自稱守中立，英法亦希望蘇聯不要再與德國過于密切了，所以又希望以土耳其作橋樑，以蘇土互助公約為關連的專，為蘇土的互助公約，為土耳其在巴爾幹的領導的事，跑到莫斯科去。在這期間，蘇聯的聲勢面孔，愈益顯明，蘇土關係，久未確定，從而英土法土關係亦未確定。這時候，我們認為土耳其態度的游移，就是英蘇鬥爭的表現。那時，我們認為土耳其最好的外交成績，是採蘇土互助公約，僅限於黑海，英土公約，則以東地中海為限，這樣，以土耳其作橋樑，英蘇的關係，可以暫時成為相安。同時，我們又指出蘇聯在現在還在執行漁利政策，尙沒有與英國衝突的決心，因此，他的要求，也將僅以土耳其不令英法可由黑海攻擊蘇聯為滿足，如果他決心要與英法衝突，則土耳其也就難於與英法保持廣泛的互助關係，而不得不採取稍為偏向蘇聯的中立政策。

土耳其外長在莫斯科，幾乎逗留了三星期多，終於蘇土談判，又以破裂，傳聞於世。據海通社的消息說，談判破裂的原因，如下：

「土耳其外交部長薩拉柯格魯，未締俄土協定，遽爾中途返國之原因，係因俄方要求，倘英蘇發生戰爭，土耳其應嚴守中立

。土國政府鑒於土耳其與英法之間有特殊關係，對此要求，礙難接受。故土外長佛然返國，蘇土談判，宣告破裂。」

哈瓦斯社莫斯科的消息，則認為談判係「停頓」，並非「決裂」，他們說：

「土國自九月廿五日與蘇開始談判以還即須在英法兩同盟國與蘇聯之間，決定取舍。此一難題，雖難解答。土國外長薩拉柯格魯爰於昨日決定返國，因此蘇土談判，惟有暫時停頓，但非決裂。查蘇聯之意，欲使土國擺脫英法兩國，此項企圖，雖與德國有利，但究其實際，蘇聯仍為自身打算。實言之，乃欲控制土國斯丹埠港，從已控制赫羅納爾海峽，以實現彼得大帝之雄心。特土國本身力量已頗強大，又與英法兩國保有聯繫，且有阿富汗，伊朗，伊拉克三同盟國（按土耳其曾與各該國簽訂近東公約）為之後盾，蘇聯自不能以對待波羅的海沿岸各小國之手腕，加諸土國」。

哈瓦斯社這段消息，曾說明了蘇聯對於土耳其的要求，說明了土耳其在談判中所處的苦境，充分說明土耳其何以與蘇聯不能訂定協定。據同社羅馬電報意大利人觀察蘇聯土耳其談判失敗之原因，如下：

「蘇聯土耳其兩國談判失敗事，就歐洲時局而論，性質極為重要。其意義所在，可以一語蔽之，即土國對英法兩國信守約束，不願投於德蘇兩國懷抱，有如某關係方面之所宣傳是也。至以談判失敗原因而論，據此間所知，蘇聯要求土國封鎖韃靼納爾海峽與博斯普魯斯海峽，勿令非黑海沿岸各國軍艦出入。此在土耳其，則決意保持自由行動，雙方爭持不下，談判由是停頓」。

各方面對於蘇土談判停頓的觀察，有如上所述。蘇土兩國本身所宣傳的，則多少與之不同。蘇聯方面的公告，沒有提及談判失敗的原因，據塔斯社說：

「土耳其外交部長薩拉柯格魯來蘇聯，已歷多日。此期間兩國政府代表將關於兩國邦交之一切問題，詳加討論，雙方於和諧空氣下交換意見之結果，業將蘇土兩國歷久不變之睦誼，以及兩政府力維和平之共同志願，再度與以證實。同時兩政府並一致認定今後當維持接觸，俾今後將一切與兩國利益攸關之問題，隨時共同討論應付辦法。」

就這一段消息來看，在蘇聯方面，絕不認為蘇土談判之停頓，為蘇土關係惡化的朕兆，蘇土兩國，仍然保持着密切的接觸，「以維和平」。現在談判，只是停頓，將來有新的局勢出現時，兩國的關係，仍可以再加討論。昨日土耳其的消息，也證實這一點。

前幾日土耳其方面的消息，則說：

「會談並未產生妥協。因蘇聯向土外長薩柯格魯提出之新建議，與土國對於英法諾言，不能融合故也。蘇聯向土國提供之保證，不能補償蘇聯欲土國担任之義務。」

這個消息指明，蘇土談判所以停頓的緣故，是由於蘇聯曾提出「新建議」。在蘇聯提出新建議以前蘇土談判的內容，又是些什麼呢？這一點，巴黎與倫敦方面說得很清楚。第一，英法還準備以蘇土談判，作為英法蘇結合的橋梁，這是我們一再說及的。據哈瓦斯社說：

「（英土，法土）公約於三星期前，已達到滿意的結論，不過因希望蘇土之間可有一與之平行的條約，該條約可與英，法，土之立場相合，且與土耳其對外國所提供之諾言相符，故而延滯簽字」。

實際上，在蘇土談判期間，英法方面一時曾允諾改訂英土法土公約中土耳其之義務，俾與蘇土談判不相衝突。倫敦每日民聲報說得很

清楚：

「蘇聯政府願已在上星期內提出種種條件。其時且傳業已全部解決。實言之，即土國在徵詢英法兩國意見之後，業已接受史太林之見解，而將英土與法土兩協定所載各項條款予以修正。詎意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得聞望獨，希圖獲得更大之利益，土國政府爰乃毅然予以拒絕云」。

這裏面所指的會行修正英土法土協定各條款，當即是我們所一再說及的，蘇土公約以黑海為範圍，英土公約改為僅以東地中海與巴爾幹為範圍的事實。現在因為蘇聯有新建議，而談判停頓，究竟這新建議，包含着什麼呢？過去我們會說過，蘇聯必然要求土耳其疏離英法，封鎖韃靼海峽，這幾點，近日各報，已予以證實。另外據說尚有其他條件。據海通社說，蘇聯要求土耳其於英蘇戰爭中守中立，哈瓦斯社所說的，蘇聯要求封鎖韃靼海峽，已見前述。南斯拉夫所傳羅京的消息，則說蘇聯提出下列三項要求：

1. 土耳其在原則上承認波蘭之瓜分。
2. 土耳其同意組織巴爾幹集團。
3. 土耳其以勢力加諸羅馬尼亞，使其接受領土上之讓步。

據說，因這幾項條件而蘇土談判停頓。但停頓之後，蘇土關係，又將怎樣呢。塔斯社已將蘇聯的態度表明，蘇土間仍常保持密切的接觸。土耳其方面亦特別聲明：「關於韃靼海峽，土耳其除其國際條約所規定者外，必不受其他條約之束縛」。但是關於該海峽的國際條約又有什麼規定呢？據說土耳其根據蒙德婁條約所定：担承外國軍隊可通過韃靼海峽者，不得超過蘇聯艦隊之力量。現在土耳其既聲明遵守國際條約，則蘇聯在黑海中，仍然有極大的保障。蘇土關係，並未因蘇土談判之停頓，比以前更壞些，這是我們特別要指明的。

跟隨着蘇土談判已停頓，十九日午後六時，英土法土諸公約，即

行簽訂。現在簽訂的公約，究竟是原本呢？或是經過蘇聯協議後的修正本呢？我們覺得土耳其為免除其將來的外交困難計，恐將堅持修正本的簽訂。據英外交部公佈，其條件如下：

- (一) 在歐洲中之一國對土耳其施行侵略行為之場合，又在歐洲中之一國所施行之侵略行為，發展成爲土耳其亦包含在內之地中海戰爭之場合，英法應給予土耳其以援助。
 - (二) 在歐洲中之一國所施行之侵略行為，發展成爲英法亦包含在內之地中海戰爭之場合，又在英法根據其所給予希臘暨羅馬尼亞之保障，而捲入戰爭漩渦中之場合，土耳其應給予英法以援助。
 - (三) 在英法土三國會給予以保障之歐洲中之一國，遭受歐洲中之一國侵略之場合，又在歐洲之第三國遭受侵略，而使英法土三國安全遭受威脅之場合，英法土三國應立即進行協議。
 - (四) 土耳其對於蘇聯所參加之戰爭，並無根據本條約而履行義務之必要。
 - (五) 英法土三國，參加戰爭之場合，苟非三國共同同意，不得締結條約。
 - (六) 本條約並不以任何第三國爲目標，係以在侵略之場合，三國間互助之保障爲目標者。
 - (七) 本條約有效期間爲十五年。
- 大體上這條條件與幾個月前所宣傳的英土協定內容，已有許多改變了。
- 蘇土談判停頓，與英法土協定簽訂，在歐洲行將引起一點小小的劇動。德國方面已然宣傳土耳其與西歐訂定軍事同盟的危險，德蘇方面最近或許有新的表示，英法方面，於極端歡迎之外，一般人更預料到「羅馬尼亞遭受侵略時，土耳其不獨將自行出而助羅，且將容納英法之海軍援助羅國。羅馬尼亞獲英法土三國之援助，故對德之態度，

勢將大硬特硬。同時，土耳其更將防止保加利亞走入德蘇懷抱。這一點，自然尚有不少的奢望在裏面。他們更希望「巴爾幹諸國家始有在英法義之勢力支配下，造成中立集團之可能」，這一點，義大利的態度，更爲重要些。自德蘇不侵犯協定簽訂蘇聯勢力伸入中歐東歐以後，義大利即示好於土，更不甚反對英法土之公約。如果後一公約，對義大利較少，則英法義土合力在巴爾幹樹立之和平集團計劃，容或可以實現。不過這一集團，仍將是中立的，他的作用，可以實現意大利的不擴大戰爭的希望，而不能實現英法的東線攻擊德國的要求更不能實現英法以土耳其作橋梁的接近，因此，英法於英土協定之時雖不得不故作喜歡，但是仍然有說不出的苦衷。因此蘇土談判停頓，英土協定簽訂後，對於近東與巴爾幹的局勢，雖小有改動，對於歐戰大局，仍未必有什麼大的影響。英國要想再拉攏蘇聯，尚須有其他的表現，英國要迅即結束戰事，對於意大利，也尚須下工夫。土耳其的重要地位，暫時行將降低。在蘇聯不想與英國正式衝突之前，土耳其的地位，或許可穩定一時，等到蘇聯有了新決心時，土耳其的地位，便又重要了。那時候已行頓的蘇土談判，又要重開了。英土公約的真正價值，在不遠的將來，就會透到蘇聯向羅馬尼亞提出領土要求的試驗。

(十月廿日)

德蘇經濟談判的價值

德蘇互不侵犯協定簽定以後，最近又正在舉行經濟談判。這談判中，將可決定蘇聯對於德國所能提供的援助，同時，也將可決定德國支持作戰的時期。據統計，一九三七年及一九三八年間蘇聯輸入德國貨物之種類與價值如下。

貨物種類	一九三七年 (百萬馬克)	一九三八年
木材	一三、七	一八、六
石油及其產品	一四、九	四、八
煙葉	一、五	三、五
原磷礦	二、九	二、九
亞麻	六、七	二、三
食物	一、五	一、三
植物油	一、三	一、三
煤坑支柱	一、四	一、三

再論中日經濟合作

曾寒冰

在本刊的第三期的「論中日的經濟合作」一文裏面，我會特別提出幾點：第一是中國工業化底事業，亟須國際資本和技術的合作，與日本地理的和民族的經濟利害關係密切，自然更需與日合作；第二是任何種經濟合作，必須在維持中國經濟行政和領土主權完整的原則之下進行；第三是任何種經濟合作，不能妨礙中國民族工業發達的自然願望，即是說：不能純粹拿中國作爲一個農業原料品供給地的場合來合作。這幾點，是我在那篇文字裏希望中日雙方的工商業資本家金融資本家和雙方的政府切實地加以注意的。

我們認爲：經濟合作，是中日一切問題的樞紐，中日的經濟合作，如果不能在理論上和實際具體的合作條件上有充分公平的合理基礎，中日永久的和平是不能尋求的。軍事的政治的以至於外交的衝突與鬥爭，將長期地或地或緊地存在，東亞永久的和平也決無奠定之可能。所以站在真正謀中日合作的立場上和誠心希望東亞永久和平實現的基礎上，批判雙方朝野經濟合作的偏頗理論和反平等合作的事實是必要的工作。

第一我們要看日本方面理論的與實踐的動態。一九三五年以來，日本方面對華經濟合作的理論，大體以「工業日本與農業中國」爲旨歸，輿論方面的鼓吹在這一原則，而實際由官方提出的具體中日經濟合作方案也是根據這一原則，主要的內容是：（一）農業方面，接受日本之技術指導，農產品與日本工業品交換或由日本收買，獎勵中國之棉花生產，由日本大量購買便是實例，（二）鐵產方面，資本和技術均協力合作，（三）交通運輸業方面，技術資本的合作，（四）紡織業與其他工業的合作，（五）中日貿易協會等的設立，（六）中日稅率的協定。

就「工業日本與農業中國」這個基本的合作原則和上列具體的經濟提攜方案內容來考察。中國方面便要變成純粹工業原料品的供給地，這是中國極不能容忍的事情，一個國家由農業到工業是社會正常的發展，也是一種必然的要求，中國不能自安於半殖民地地完全殖民地地位，發展工業當然也是她的天然願望，日本在合作的理論上和實際合作的事實上企圖將中國停滯於農業階段，使日本能充分利用中國原料，得到工業的利用價值，以繁殖其自身工業的高度發達，事實上不管將中國淪入於殖民地的命運，跟着這一時期的經濟合作的聲浪，日本的軍事，政治勢力固然早已使東北四省淪亡，而且冀東不合法的組織也樹立起來了，華北政權特殊化的形態，也日益顯明，日本開發華北的意圖和實際工作，很顯明的是要在這些組織之下進行，至於忽視中國海關行政，隨便走私，那還只是一種附帶的事態，所以這一時期，日本當局所倡導的中日經濟提攜理論及其具體方案，完全是侵略性的，伴着這侵略性的經濟方案而來的，便是對華軍事政治的大肆進攻。

跟着日本方面經濟合作的理論和實際的趨向於侵略形態，中國這一問題上也在起着極端的反抗態度。當時除了官方與實業界方面認爲中日經濟可以合作并希望得到平等的合作之外，其餘在輿論方面大都是認爲根本不能合作或根本反對合作的。大體分析起來，可以有以下的幾種意見：

（一）官方與實業界的意見認爲可以合作，譬如中國實業界赴日經濟考察團團長吳鼎昌氏，認爲中日兩國經濟之至今不能走上提攜的軌道，全是由於認識的錯誤——即是以爲兩國經濟是有利害衝突的。他本人則認爲日本已進爲工業國，中國則仍爲農業國，兩國間的生產

品，衝突之點很少，即使有衝突的生產品也儘有協商避免衝突的餘地的，這近乎容許「工業日本與農業中國」的根本原則，是當時最受攻擊的主張。

(二)是認爲日本的帝國主義沒有消滅之前，中日決無經濟合作之可能，有之則中國不僅是單純地殖民地化，而且是加速破產下的殖民地化，並且還就輸出商品類別如棉花，鋼鐵，羊毛，機械工具等等來證明日本所需要的商品，十分之八九也是我們所需要的，而日本底主要輸出品，一部分也是中國底主要輸出品，另一部分是中國的主要工業品。因而認爲只有衝突競爭，認爲「依然停留在農業，手工業，和輕工業底生產過程當中」的日本和半殖民的中國，利害是無可調和的，如章乃器諸人都是持的這種論調，也可以說是人民陣線派的重要觀點。

(三)是認爲在領土的絕對完整和國家主權的絕對平等的條件之下，中日經濟是可以合作的。但這種理論在當時的客觀環境之下不能抬頭，因爲日本當時的軍事政治行動，在在都以尖銳的形勢破壞中國領土與主權的完整，主張這種合作的人，被現實的事態打擊，自然是不能不消沉了。

結果跟着日本軍事與政治侵略的加緊，中國在經濟方面的不能合作論和畏懼合作的心理便跟着加強。官方和實業界方面的合作理論，亦無從實現。中國本來是本地需要外國資本和技術的幫忙的，但在上述的情形之下，變成了拒日本而趨歐美的傾向；結果是：

(一)中國向英美去乞求借款，如一九三三年底向英要求二千萬鎊的借款，向美國銀行要求一億美元的借款，一九三五年二月又向英國要求八千萬鎊借款，雖然都遭失敗，但仍然不感到喪氣或動搖親英美的心理，然而對於日本自願提供的二萬萬元的信用放款，却是嚴閉固拒的，爲什麼呢？因爲英美的借款，不致有損中國的主權，而日本借款的作用，就當時日本全盤對華經濟方案來考察

是可以懷疑的，其結果自然是只有出於拒絕之一途了。

(二)在技術方面也是一樣，雖然日本自願給予中國以技術方面的幫助，但中國不敢接受。這理由很明白：因爲日本沒有給中國的領土主權以確切的保證，而且事實上適得其反。沒有這個保證，所謂日本對華技術幫助也者，在領土主權的強力轉換之下，實即日本自身技術的發展。這一點即足迫使中國歡迎國聯對華技術合作，要求英美甚至德國的技術幫助，而對於隣邦的日本，則取畏而遠之的態度。

(三)這其間各國經濟考察團競相來華考察，如日本政友會組織的考察團，日韓合組的經濟考察團，日本電通社所組的經濟考察團！英國以李滋羅斯爲首的經濟考察團，美國以白克爲首的遠東經濟考察團和德國以克樸爲首的經濟考察團，都於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初先後來華，當時中國之期待和希望以及歡迎情緒之強烈，都是歸之於歐美方面的，理由仍然與(一)(二)兩項所說一樣，其結果，李滋羅斯的來華，奠定了法幣制度的基礎，中國的幣制與英鎊聯繫而與日元隔離，這固然是列強在華貨幣權爭霸時英勝日敗的一幕，但中國自願跌進英國的懷裏，也是很顯然的。

爲什麼有這樣的傾向呢？與其說是中國之不了解日本，無寧說是日本不諒解中國有以致之；因爲在當時日本的那種中日經濟提攜理論和具體方案并跟着這種理論和方案所實施的軍事政治侵略狀態來看，怎能使中國了解日本并以親英美的態度來親日本呢？還是決不可能。

總之，日本方面無論如何掩飾，在以前是企圖以軍事政治的壓力來實現中日經濟提攜，在經濟提攜之中又來加強軍事政治的控制。轉運用以使中國殖民地化的。這就當時日本的意嚮而論，即令是衷心主張中日和平合作的人，也只能作如此看法。

日本當時以軍事政治壓力逼使中國走英美的路子，既走之後，想

不出別的法子，仍然是以軍事政治力量來強制想把中國從英美的懷抱中拖回，結果是法幣制度成立之後，接着日本的炮聲在蘆溝橋又響起來了。

此後的兩年，中國沒有考慮到與日經濟合作的事情，也沒有條件可資中國以考慮的餘地，有的只是血肉的犧牲，結果中國固然是受着大損，但日本也不能不說受着小損了吧？

至於這期間，在日本方面，對於中日經濟合作的理論却正在發展，但侵略性的不平等的本質并未變更，所時時翻新的，只是名詞花樣。在東亞協同體「，「日支滿不可分」等大前提下，主張「經濟連鎖」，「經濟單元」，「經濟集團」，而欲構成「家長制」與「立體」式的合作關係，這種理論的偏頗，在頭一篇論文裏，我已經嚴格地指出。

其次我們看淪陷區內的事實，日方所進行的經濟事業，完全是在東北所進行的壟斷和獨霸事業的擴大，沒有異致，我們現在舉幾件很明顯的事實來證明。

第一是經融機關，最顯著的如華北聯邦準備銀行，華中華興銀行，業務管理屬於日方，這是對中國經融主權的侵略，資本額的分配，中國方面極其輕微，這是對中國經融的一種實質控制和損害。

第二是壟斷組織的推行，如去年十一月七日同時成立華北華中會社，華北會社的事業計劃分為（一）交通運輸及港灣，（二）郵電通訊，（三）發電事業，（四）鑛產，（五）鹽之製造販賣與利用等，華中會社的事業計劃分為，（一）鐵道，（二）水運，（三）通信，（四）無線電播音，（五）電氣與自來水，（六）鑛產，（七）上海公用事業，（八）水產，這顯然日之東北「滿鐵」計劃的移植。

第三是工商方面的活動，日本幾乎採取一種原始的掠奪形式，如江浙——無錫，杭州，蘇州，湖州，嘉興，海寧，德清，上海四郊等地的蠶絲工業，完全由日方「華中蠶絲株式會社」所統制，而上海方

面的華商蠶絲工廠，現在遂不得不因原料缺乏而停工萎縮。紗廠方面，戰前原由華商獨資經營者，自戰事發生地方淪陷以來，由日商收買，承辦或逕由日方軍事當局直接加以接收和管理者，所在多有，如青島之華興紗廠，濟南之仁豐，成通，成大，唐山之新華，山西之晉華，晉生，大益成，雍裕，石家莊之大興等紗廠，均經由上述的形式轉入於日商之手，此外如唐山啟新洋灰公司，濟南致敬水泥公司，上海華商水泥公司，龍潭中國水泥公司，太原西北洋灰廠，南京江南水泥公司，亦均經由上述方式次第歸日商控制，其餘許多工業，表面與日商合資經營而實權操於日商之手的，尚極多見。事實上這都不是合作，而是對於半殖民地或完全殖民地的一種掠奪和榨取。

拿上述日方的經濟合作理論作基礎，拿日本在中國淪陷區所作成的事實作榜樣來實行中日經濟合作是可能的嗎？我可以決然地說：這是絕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有可能的話，那只有在兩種狀態之下：第一是日完全將中國征服，淪中國為純粹殖民地時，可以如此。但這時已經不是合作而是統治了，第二是中國自甘處於奴隸的地位與絕對雌伏，然而兩年以來堅強的抗日行動，證明中國決不是自甘雌伏的國家，關於第一點，日本現在似乎還沒有這個力量，關於第二點，中國毫無有這種趨勢。所以結果要談中日經濟合作，舍改絃更張之外別無他法。

然則怎樣地改絃更張呢？簡單地說：第一是要重新建設起中日平等互惠的經濟合作理論，第二是要以平等互惠的經濟合作事實來證明日方的誠意。而這種事業，主要的是需要日本方面能够改變以前的態度的。就大體而論，日本官方的正式聲明，已經有向這目標邁進的傾向。如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之近衛聲明中之關於經濟合作方面有這樣的話：

「關於經濟關係，日本並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的獨占，亦非欲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所要求者僅為中日之提攜與合作而已，

即在中日平等之原則上，中國許可日本臣民有居住及營業於中國內地之自由，以促進中日兩國國民之經濟利益，且鑑於中日間歷史的經濟的關係，應予日本以積極的便利，俾得在華北及內蒙地域，開發及利用其資源。」

這一段關於經濟合作的聲明，除了「應予日本以積極的便利，俾得在華北及內蒙地域，開發並利用其資源一項，我們不知道所謂『積極的便利』在實際上的要求上至何種限度而須要保留以外，大體上我們以為是可以接受的，因為他所揭舉的有幾個原則尙算公允。

第一日本在中國不欲實行經濟獨占。

第二中日經濟合作，不強使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

第三承認中日平等的原則。

但原則是原則，我們認為重要的是使實際的事實合乎原則，而不是僅止乎有一種好聽的原則的虛垂，如前所述日方在中國淪陷各地的金融業工商業的設施與活動，不但違反中國國民的希望，事實上與近衛聲明的原則也是大相背馳的。所以將來中日和平結束戰爭和平等的經濟合作開始之時，第一步的工作，是要日方能夠自動取消在中國許許多多壟斷和掠奪組織。這樣始可給合作的前途，開闢一條康莊的大道。第二步的工作，纔是在經濟行政主權不相侵害和互惠平等的原則之下，進行某種有利於雙方的事業，適當地分配資本的額數，適當地應用技術和調整業務的管理等等。

這是中日雙方的核心問題。這問題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中日雙方均免不了要墮入泥淖而不能自拔。事實是這樣：日本如果不想得到或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時，對華的戰爭算是了無結果，由於無填補的消耗，國力是不免於衰微的；中國如果不想尋求或不能尋求合理的解決時，抗日的戰爭也算是毫無結果，由於無限制的破壞，國家是不免於滅亡的，反之，中日雙方如果認識了這種共同的利害，各自捐棄其從來的偏頗觀念，從而相互間衷心從事於平等互惠的經濟合作，由平

等互惠的經濟合作的成功，相互間軍事政治以至於外交的衝突與鬥爭，便從而泯滅。東亞永久的和平，亦藉此可致。這一事業是中日有識之士所應共同邁進的事業，我們站在中日和平合作的立場上，希望能早日實現。

「真實的行動」

畏公

任何理論，必須能實踐，要有實踐，換句話說：即必須要有真實的行動來證明，理論的本身才有價值。

不能實踐的理論，實際上等於說謊，可以實踐的理論而不實踐，是行動對於理論的欺騙，實際上也使理論空泛。所以重要的還是在乎實踐的行動，牠可以使理論堅實，使理論發展，由於批與理論的嚴密聯繫，可以正確地解決一切問題。

現階段中日間的問題的解決，也要如此。中日兩國，現在決不能只有虛懸的平等合作的理論，虛懸的理論不能用虛實的行動來證明時，則理論越唱得高，離事實越遠，縱令這理論是可能實踐的，但行動對她欺騙了或是跟不上，牠的內容便要變成空泛，而表面也要近乎欺騙的。

這給予對方是什麼影響呢？第一是懷疑，第二是懷疑，第三仍然是懷疑，懷疑的心理，事實上要變成隔離，這隔離，便成爲雙方間解決任何問題的障礙。

要消滅這種隔離，惟一的是要以真實的行動來實踐理論，證明理論。有了真實的行動，中國人民的懷疑便要消失，懷疑消失，則隔離更於何有？

論行政制度之確立(二)

白瑞光

行政行為之法的規定——我們論行政制度重在如何發揮行政能力，如何增進行政效率，但這裏有一個不能不注意的問題，那就是行政執行時怎樣才不妨害人民的自由。行政的目的在執行法律命令，在管「事」，不在管「人」。行政事務是如何維持治安，如何保衛人民健康，如何獎勵實業，如何管理交通，再具體一點說是在如何辦學校，立醫院，修公路，造森林墾荒地，調查戶口，經營國有企業等等。這和君主專制的行政專在如何管理人民，壓制反叛以鞏固他既得政權者不同。近代行政爲了處理事務雖有時不得不與私人權益發生抵觸，如徵收租稅，設權，剝權，許可，認可，確認，行政執行等，但這些行政行為仍然是對事的而不是對人的，這種合法的作爲不能算作妨害人民自由。這裏需要的是法規的明白確定和周密，並要行政機關切實遵行。

現行行政執行法規定的行政執行不外罰鍰，代執行，直接強制三種，並無其他規定，但在實際上，中國各級行政機關對於人民常科以罰金，或拘束其身體，甚或體罰。其觸犯刑法的行爲不論，有許多官吏，並非爲了犯罪，他們也祇是爲了執行法律，目的在使人民對某事之作爲或不作爲，也就是爲執行公務，實現政策，而罰人打人，這明明明白白是妨害人民自由，而中國官廳竟「司空見慣」極普遍的在流行着。這有幾種理由：第一是中國人民受幾千年的專制壓迫，視官廳之罰人打人爲當然的事，所以他們受了委屈也不會告狀，他們祇有心中仇視政府，懷恨官吏而已。第二是官吏雖犯刑法而法院沒有力量處行政官吏以刑罰。第三是官吏不明瞭行政法，不知他對人民有多大權力。第四是許多邊鄙地方民智未開，不有打罰行政是作不通的。第五是行政官吏誤解警察權。第六是行政官吏有權處理特種刑事犯。關於第一種理由的救濟在普及教育，第二種在增強法院的力量均非

本題的範圍。關於第三種理由，將來文官制度確立，非徹底了解法規的人不用，自然可以改良。關於第四種理由到是一個重要問題，因爲中國社會上確有一種頑民，若用提高社會教育程度的辦法，非短時期所能奏效，其中最冥頑不化的，有終身無可以救藥的希望，這是行政官吏妨害人民自由之最大口實。我們對這點的主張是擴充刑法妨害公務罪的规定，或將不履行政執行罰視爲妨害公務，而授權予司法機關以懲治他。行政官吏仍不能濫用職權，私擅逮捕拘禁或處罰，行政機關的濫用職權才是最危險的呢！關於第五種理由，警察行政本有急狀權，但這種權力仍受行政執行法之拘束，不能曲解，至於違警罰，其懲罰的對象，按違警罰法的規定皆極明確，更不容比附援引。我們主張把警察權和警察行政獨立頒布一種法規（把現行的警械使用條例包括在內）明定權限，如此則警察既不致逾權，又可在他那廣大的權限內充分發揮警察作用。關於第六種理由，事實是這樣現在有許多特種刑事司法多歸行政機關執行，如劃匪期內懲治盜匪條例（後改爲懲治盜匪暫行條例）懲治土豪劣紳條例，禁烟治罪條例，禁毒治罪條例，懲治漢奸條例等等，都歸各省保安司令管，由兼軍法官之專員或縣長審判。於是現在的專員縣長便可隨便殺人，以致藉詞敲詐，蹂躪人權，因而一般百姓怨聲載道，甚至向淪陷區域逃亡。在百姓看來官吏是代表國家的，官吏的草菅人命，他們便怨恨政府，這是近時行政的一大弊端。我們主張特種刑罰法令盡可存在，惟仍須由法院審判，而不應與行政官吏以審判權。可使各級行政官吏檢舉，或行使特種刑法之檢察權，如普通刑事法庭之檢察官，這還可以。若叫行政官吏審判，有侵犯司法獨立之嫌，對收回領事裁判權也有妨礙，況且行政官吏多無處理審判實務之知識或經驗，實際上也無暇兼顧，即或僱用一

個法律專家作助手，而那個法律專家沒有法律上的地位，沒有司法官的保障，沒有檢察，法醫，書記官等等一切法院的設備，法律家也是束手無策。若設備周密除非另成立各級特種刑事法院，這顯然不可能，那麼惟有把特種刑事的審判權仍然歸還普通法院。現行的特種刑事審判，祇有一級一審，除軍事委員會復判外，不受任何限制，所以危險性大。實際上在這個制度下不知死了多少怨鬼冤魂。將來重建行政制度非把這種弊端除掉不可。

二、確立人事行政制度

訴願與行政訴訟——訴願與行政訴訟是官署侵害私人法益的訴訟。其與普通訴訟不同者惟在被告是官署，因此英美等國歸普通法院審理。我國仿歐洲大陸制度另設行政法院，但實際上處理案件極少，我們認為不如仍歸普通法院。

人事行政制度即所謂文官制度，近三十年來中國人士已漸漸覺悟中國政治之不良大部是由於人事行政之腐敗，總理首先指出這個要點來，所以主張考試獨立，中間經過許多學者的討論，和許多黨政議決案，許多有關的立法，但實際上並沒有多大的改進。這種制度上的「惰性」所謂積重難返者，必須用極大決心，和全般改造的設計方才可成功。修訂後之國民黨政綱明定「確定文官制度，登庸各方面行政人才。」因此本文在這與民更始的機會裏提出建議來。

最近全國官吏，除中央有些少數學識較優者外，下級官廳大多多的官吏還是胥吏出身。這些人對於新的行政技術完全不知道，就是現行行政法也不明瞭，他們處理行政事務最合法的方式是「檢卷」，他們的根據是「案查」如何。（近代行政進步，側重事業方面，新的方法決非翻閱成案所能找到的。況且，慣例的效力應在成文法之下，因此必須先行引用現行行政法令，如法令所無才能援引前例。）他們多半從小進衙門充當書吏，漸漸學會了「等因奉此」一類的擬製公文方式，於是書吏升充科員科長以及其他高級官吏。說來他們的經驗是不

少，而他們的經驗中大部是怎樣申通舞弊，怎樣迴避責任，怎樣逢迎長官意旨的經驗，日新月異時時進步的行政技術是他們夢想不到的。真正掌握中國行政界中下級幹部的都是這般胥吏。新畢業的政治系大學生插不進腳去，他們操縱，壟斷，把持，賄賂，包圍長官，屈意逢迎諂媚，使潔身自好的，視政界為畏途。大學生對於「等因奉此」一類的公文多不熟練，賄賂諂媚的技術也不高明，因此分向兩個途徑走下去，一是被胥吏打下擂台，排除於行政職業之外，一是被胥吏同化，也一模一樣去仿效胥吏，在胥吏中爭得一個飯碗。這樣一來，許多有知識人在無知識人支配之下，胥吏們專會作威作福，許多人爲了飯碗便不得不敷衍，他們目的在按月支薪，誰肯努力作事，作也作不通，結果全國官吏都來敷衍，還談得到行政率嗎？所以確立人事行政制度刻不容緩。

公務員的任用——人事行政的第一順序是公務員的任用。公務員的任用本有「權衡任用」、「經歷任用」、「學歷任用」、「考試任用」、「自由任用」等區別。我國現行公務員任用法把前四種辦法全都採用了，事實上則祇有最後一種辦法普遍的在實行。依法應當是先經銓敘合格再行任用，但事實上現在我國的公務員任用了許久以後才呈部銓敘，或有根本不呈報不經銓敘的，結果公務員的任用是否合於公務員任用法，誰也不知道，並且誰也不管。所以儘管法律上怎樣規定，他們用人還是絕對自由。關於「經歷」到是我國人士所最重視的一件事，但和學理上所說的「經歷」大有出入。學理上的經歷是重在作某種事的經驗，尤其是好的經驗，也就是作事的成績。譬如對於一個候補公務員，考察他曾經作過那類的職務，是教育行政，還是實業行政，是法官還是財政官吏等等。其次考察他作了多長時間，而尤重在他作的好壞，最後是爲什麼離去的。我國却不注意這些，祇要他作過縣長便可再作若任官，作過廳長便可作簡任官，不開他的縣長和廳長是爲了違法失職而撤職的，或是爲了才力薄弱不勝繁劇而辭職的，或是因老

病而退休的，抑或因任期終了或機關裁併等其他原因而解職的。假設一個省府廳長作了半年便因受賂受了刑事處分而當然解職，這種「歷史」有甚麼價值呢？不但如此，就是他作了三年而毫無成績，作一件事總是失敗的時候多，這種經驗又有甚麼用處呢？這一類的人，不論職位高低，根本就不應當再用。並且，中國的經歷任用，好像是一種注定的命運，如這個人會作過部總長，就是他已去職了仍然稱呼他總長，作過省長或省主席的不會再作縣長一類的小官，任官的人也在考慮說：「小事他不肯作吧！」反之，會作月入五六十元的小吏，就是有學識有才幹，也就命中造定了，再作事也不過七八十元的待遇。這種制度的結果是，行政職位永遠為一般陳腐的知識落伍者所包辦，新進後起奮發有為的青年不易施展。因為注定的命運，人人不願做小官，稍有點辦法的人大家都想做大官，因此對於高級職位競爭劇烈，競爭的手段也愈趨而愈卑劣。這種辦法須徹底改革。

學歷任用近來也漸推行，如中央政校及各種訓練所，畢業後即分發任用。考試任用也已舉辦，如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及各特種考試。不過依這兩種辦法任用的人員沒有保障，常於任用後短期即被辭退而考試權不能集中於考試院，取錄標準遂有高低，又考試次數太少，錄取人數太少，考試本身還有無數的缺點，如某屆高考出題錯誤，某屆高考記分錯誤，都是已經發覺的，其未經發覺的還不知有多少？況且照孫總理的主張不是一考試任用一而是由考試取得被選舉或被任用的資格，這和現行的考試制度大有差別。因此學歷與考試任用也有應改革之點。

現行任用制度，可以叫你自由任用，實在還有一種保薦制度，這和美國的保薦制度迥異，美國最流行的辦法是有一個缺，考取三人，保薦於上級官廳，由上級官廳決定一人。中國多半是一缺祇保薦一人，決定者多半沒有選擇的機會，他祇決定用不用，而按慣例都是一保就准。保薦制度本來是很好的制度，在中國歷史上行之很久，從西漢起就有保薦的制度，可是西漢的保薦制度比現在的保薦制度還嚴密還好的多。那時候保薦人要負責任的，被保薦的人若是違法失職，保薦的人要連坐或受懲罰的。而且對所保薦的人多半是稱述他的才能而不指定作什麼官，所以有的以卑職著大官，被薦的人更不在薦主的手下辦事，還有一件就是保以後，仍得到皇帝或長官那裏去面試，然後才能決定任用。現在的保薦多半祇是一種形式，實際等於自己自由任用。

用。

一個機關的長官對於屬官的自由任用也是歷史遺下的制度，中國古來機關長官負責全責，本機關的行政和經費都由他包辦，甚至本機關的組織都由他自己決定。如清代各下級衙門多半是包辦的，流弊自然很大，但清代的制度有兩大優點，一是科舉制度，一是銓敘制度。科舉制度其考試內容極為嚴密，因為中外人士所詬病，但科舉時代的考試是公平的，是公開競爭的，科舉出身的官吏比較是清廉的，而且大多數官吏都有皇帝所要求的知識（自然不是我們所要求的行政知識）。清代的銓敘制度也極嚴密，銓敘大權操之於吏部，一個縣班子便決不能作道台，道台班子也不能作督撫，若升級非因有功由保薦經吏部銓敘不可。因此昨天是個平民，有了好親戚今天便作縣長是不可能的。全國官吏都須經吏部登記銓敘，否則不能任用。現制承襲了重視經歷階級的制度却丟棄了吏部嚴格銓敘的辦法，遂致任途混雜，吏治愈益腐敗。其實法律上如使機關長官負責本機關行政全責，自由任用屬官也有理由。那個機關長官他可以說既然讓我負責，那麼我的屬官非忠於執行我的政策不可。祇有我所認識的人，我的親戚朋友我真知道他，我相信他，我敢替他負責；外人我不知道，我不相信。這種說法好像理由很充分，實則不然。行政官吏在執行法律及政務官決定的大政方針，雖則在執行當中不無自由裁量之餘地，但行政官吏不能有所謂我的政策。在任官以後，這個屬官在公務上聽你指揮就夠了，不聽你指揮你可懲戒或去掉他，要他忠於執行法律，執行國家政策，不要他忠於私人。知道與相信的問題，可以國家的銓敘或考試考績，鑑定其學問品行，以代替私人的相知。國家考取，銓敘的人便是國家知道他，國家相信他。在任官以後他在公務上聽你指揮你就可以替他負責。這有英國的實例，英國各部大臣都替本部屬官負責，而各部屬官都是事務官，他們都是久任於職，不隨內閣進退的，更不是部長的私人，但在執行職務上絕對聽部長指揮，而部長替他們負行政全責。所以官吏的自由任用必須有普遍的考試銓敘制度，那就是總理所說「國民大會及五院職員，與夫全國大小官吏，其資格皆由考試院定之。」（自傳）因此關於公務員的任用，我們主張普遍的公開競爭考試，（任用與確定資格均用之）再加普遍的必經銓敘，並佐以各種行政專門訓練學校畢業生的學歷任用，以建立完善的任官制度。至於經歷則祇可作銓敘的一個條件，因為新的經驗任官以後還可以取得。（未完）

獨裁政治與民主運動

甯禮

雙十節的中華日報社論汪先生發表了『中華民國之新生命』一文，列舉抗戰期間的腐敗狀態與獨裁下的黑暗。以汪先生在黨國的地位，當國家民族的危亡時期，處於重慶腐敗環境和黑暗勢力之下，竟不能公開地對國事有所主持獨裁下的中國政治之黑暗專橫可想而知。所以汪先生在列舉舊年雙十節前後的三件事之後，接着便很沉痛地說道：

『試以上述三件事為例，軍事最高當局，有把人民的生命財產，一點放在眼裏沒有？有把人民的自由，一點放在眼裏沒有？人民的生命財產，如此浪費，固然可痛，而人民的自由，真可說是細了手足，蒙了耳目。……有人說道：『這是在抗戰的大前提之下，不得不然』。是的嗎？請看英法等國，抗戰時的情形，是怎樣的？英國國會裏頭，路易喬治依然可以提出和平主張，其他議員，向來反戰的，依然可以提出反戰的意見。我呢，在重慶不能哼一聲，離開重慶總能哼得一聲，立刻便要殺以滅口，王寵惠呢；總得半聲，立刻便要他改過口來，至於三，否則也要殺以滅口的。殺沒有什麼可怕，可怕的是哼不出聲來，一個副總裁，一個外交部長，尚且如此，其他可想。』

上述現象，在歐美民主國家裏面，無論如何是找不出前例的。這種政治，我們應該讓他在嗎？如果我們放棄對歷史的任務，讓中國永遠停滯在封建的專制主義時代則已，否則這種政治是決不能讓牠存在的。政治雖然是經濟和社會的一種上層結構，但一種前進政治，是充分地有改造社會推進經濟的優越作用的，沒有這樣的一種政治，社會經濟決沒有加速進展的可能。中國是社會經濟極其落後的國家，尤其需要建樹這樣一種優越的政治作為加速改革社會經濟的工具。但事實的存在與此相反，所以民主運動，在歐亞各國已經成為歷史陳跡的，在中國還沒有完成其革命的任務而亟待於努力的發揚。在現階段的中國獨裁政治之下，其主要的形態是怎樣呢？

第一是政府中的派系和重要官吏，都成為獨裁者私人，威屬，他們附麗獨裁者的權勢之下，結果是對獨裁者私人負責，而對民族國家倒反置之度外。

第二是軍隊的組織亦以獨裁者為中心，軍隊成了維持私人權勢的工具。失去了軍隊為保障國家民族而又為國家民族所有的近代精神。在這種形態之下，政治上的弊害是怎樣呢？對於民族國家的影響，又是怎樣呢？

第一是政府中的派系和重要官吏既都是獨裁者的私人威屬，結果便失掉人才主義的宗旨。一方面是政治效能的降低，另一方面，便是朋比為盜的出現，中國政治的貪污，腐敗，爭營，零亂，均當溯源於此。

第二是軍隊既仍然是中古部曲式的隸屬私人，事實上便跟着私人利害以為轉移。可以興亂，為着維持個人權勢，軍隊成為個人工具，國家多次的內亂，因此而起，國家民族力量的前進發展，亦因此而受極大的障礙。

第三是獨裁者既處處不能捨去私人權勢和派系的利害打算，自然人民的言論自由與參議政事，事實上要妨礙獨裁者的行為，所以壓制言論，成為獨裁政治下的必然手段，這便要摧殘民意。其結果，社會的進步亦因之滯慢。

如前所述中國現階段客觀的條件，是需要優越的政治來促進社會經濟的改造。軍事獨裁政治既為建樹這種政治的障礙，故反獨裁的民主運動，遂成為當前革命建設的中心工作。我們現在可以提出這個運動的具體的幾個要旨：

- (一) 打倒以個人權勢為中心的封建式的義附私屬政治，建設起官稱其職吏盡其能的近代政治機構。代之以民主集權的精神。完成近代國家的條件。
 - (二) 打倒中古部曲式的軍隊系統，使軍隊國家化，完成近代的國防軍事組織。
 - (三) 確立人民的言論自由與參政機構，提高全民族的政治知識和能力。以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
- 民主革命，是通常必須經過的歷史階段，中國民主革命的可以完成，也是必然的事實。上述數條，便是我們從事民主運動的具體方向。

兩年來的國內文化界

(四)

望雲 寄自內地

九 理論導師——陶希聖先生(上)

提起陶希聖先生的大名，國內外學術界的人士幾乎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他與胡適先生同是稱霸文壇，譽滿國際的學者，他與胡適先生正代表中國兩個轉變的時代。

近三十年來的中國，在文化運動史上，有兩個大的轉變時代，一是五四運動，一是北伐運動。前者是政治運動轉而為文化運動，後者是社會革命，影響激成文化運動的轉變。五四運動的文化運動，是科學運動，由於這一大運動，中國腳踏實地的學習西洋的科學方法，科學文明，這一時代有一位代表人物，就是胡適先生。胡適先生自五四運動以來，驍馳文壇，斐聲國際，走了十多年的紅，北伐的浪濤，將他捲沉了，至少是暫時的沉伏了。同時北伐的巨浪也湧起一位代表人物，就是陶希聖先生。五四運動在文化上的收穫是學習西洋的科學方法，北伐運動在文化上的收穫，是以已經學得的方法研究中國的社會現象，有了以中國問題為主題的社會科學。五四運動的文化運動，注重在科學方法，產生的有價值的作品多屬於哲學方面，胡適先生的「哲學史大綱」上卷就是這一時代的結晶。也無怪作時代代表人物的胡適先生常自詡治中國哲學史他是開山祖了。北伐運動以後，文化的活動是以已經獲得的方法，來研討中國社會的本身，許多有價值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的論文，就是這一時期的代表。治中國哲學史胡適先生不愧稱為開山，若說到治中國社會經濟史的開山祖，非陶希聖先生莫屬了。所以就客觀的事實而論，五四運動與北伐運動是中國文化史的轉變時期，這兩時期的代表人物，前者是胡適先生，後者是陶希聖

先生。

陶希聖先生領導文化運動，執定文化運動的主潮，自北伐以來直到現在。尤其是抗戰時期更顯出他理論領導者的卓越才具，與深刻影響。

北伐運動中，陶希聖先生是一位戰士，北伐以後他棄武就文，從事於學術研究，文化活動這一時期他的大部份著作是關於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如「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中國社會現象拾零」，「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等。陶先生的影響所及，引起普通的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史的研究，促成熱烈的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中，有所謂「陶希聖主義」，有所謂「陶希聖派」，有所謂「食貨學派」。所謂「食貨學派」是指陶先生主持的「食貨學會」而言，食貨學會的代表刊物是「食貨半月刊」及在天津益世報創刊「食貨周刊」是中國專攻社會經濟史的空前刊物。治中國社會經濟史的，離不開陶先生的著作，如同治中國哲學史離不開胡適先生的著作是一樣。你想學治中國社會經濟史的方法，門徑，體制，只有陶希聖先生的著作。讀成陶希聖先生的方法與觀點的人，可以因之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反對陶希聖先生的方法與觀點的人，可以因之找出自己的論據。說句笑話，在前些年所謂「文壇登龍術」之一，是「罵胡適」，在近些年「文壇登龍術」之一，就是「罵陶希聖」了。

陶希聖先生自從民國二十年以來充任北平國立北京大學教授，直到現在，抗戰發生，抗戰的需要拉他離開教書生涯，他成了戰時理論的指導者。陶希聖先生是與胡適先生同負盛名的中國名教授之一，在北大、清華、師大等各大學，他的叫座力之大，為於胡適先生而上之

，這是時代不同有以致之。陶希聖先生不僅名滿國內，而且遠及歐美日本，在日本有專研究陶希聖作品的「陶希聖講座」，於此可見他在文化運動上功績之一斑。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汪蔣二公東逸國內著名學者，社會名流，在牯嶺開茶話會，陶希聖先生是被邀請者之一人。牯嶺的茶話會尚未結束，蘆溝橋的炮聲已響，陶先生從此沒能再回北平。在北平陶先生遺失二百多萬字的宋代經濟史料，十多萬字的中國社會史第一卷，及近二十萬字的中國古寺院經濟史。至於五六年來在陶先生指導下七八人搜集的社會經濟史的材料，卡片，原稿，抄本，損失追盡，其中有許多是歷史上著名的碑銘拓片，都是不易再尋得的珍貴資料。自蘆溝橋事件，擴大成中國的全面抗戰，陶先生即追隨中央政府參與國策的研討。陶先生的文化工作改變了一個方向，不再研究已往的社會史實，而是旋轉現實的社會活動。陶先生在所著的「集體安全與國際新均勢」(二十七年二月漢口出版)的自序上說：「自牯嶺茶話會以後，我追隨中央政府，參與外交的討論，到如今半年了。半年裏面，由於政府公開或秘密的情報，我對於中國的國際關係，知道得比較的多。有時我自動的解釋政府的外交政策和中國的國際關係。有時我爲了糾正一般不正確的宣傳，說出幾句話來」。的確兩年來，陶先生的論文，大部份是關於國際問題的，小部份是關於國內政治問題的，在下節我的簡略述及。

陶先生追隨政府，參與外交討論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在南京成立國防參議會，陶先生是國防參議會的會員之一，這個會是包括中國所有的各黨各派，不論他是中國共產黨，中國青年黨，中國社會黨。二十六年冬政府西遷，陶先生也由南京到了漢口，二十七年二月在漢口成立的「藝文研究會」是陶先生一手主持的，「藝文研究會」的性質及成績在前數節已經述及了。二十七年七月「國民參政會」成立，陶先生是參政員之一。據傳第一次參政會時期，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參政員

在會外接洽，共產黨的代表是陳紹虞，周恩來，國民黨的參政員，負責與共產黨接洽者就是陶希聖先生，而且陶先生被人目爲國民黨參政會中國民黨團的發言人。在漢口時一度盛傳他將出任國民黨青年團的宣傳處處長，各報還載着他將任湖北教育廳長。漢口危機，政治中心由漢口移往重慶，先生於七月底到了重慶，在重慶的工作與漢口相同。二十七年十一月由重慶去成都講演，十二月初應國立西南聯大之邀飛往昆明講演，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汪先生到了昆明，陶先生便與汪先生一同出國了。出國至今，行將半載，我們也不知道他的消息，也沒有看到他的作品，也不知住居何處了。

讀成陶先生的固然同情他，即是反對他的也多爲他善於處理問題，提示綱領的天才所折服。在漢口時某著名經濟學家會說：「國民黨的理論，陶希聖是領導一期的，可惜他的勢太孤些」。所謂勢孤指國民黨的理論家太少，沒有人能幫助他。共產黨及所謂左派會給陶先生送一個徽號，說是國民黨的「理論參謀長」，這是與軍事參謀相對而來的。算國際著名的某外交問題專家也會讚談陶先生的國際論文有他人所不能及的巧妙與獨到之處，及至十二月底大家聽到陶先生隨同汪先生出國的消息，同走的還有周先生，同情國民黨者莫不爲國民黨痛惜、痛惜發揚國民黨理論的人，全離開重慶了。自總理逝世後，聞發主義，樹立思想標的的無異的是汪先生。北伐成功以後的二、三年間，正值汪先生遊遊海外，當時支持國民黨理論的是周佛海先生，「三民主義理論體系」及「三民主義根本問題」都是周先生那時的傑作。抗戰發生，汪先生政務紛繁，周先生早已不談理論一調，發揚三民主義，指導戰時思想的只有一位陶先生。假若是隨着政治中心轉移的人，而且是常看時事論文的，就知道我說的非虛，我稱陶希聖先生是理論導師，亦非譽辭。

十 理論導師——陶希聖先生(下)

現在我的由事實證明，陶先生是位戰時的理論導師，好在由抗戰發生到陶先生出國，十八個月間陶先生所發表的論文不過數十篇，容易搜集，容易檢討。搜集檢討以後，不難發現他領導文化活動的轉變點。

蘆溝橋事變發生，全國人心鼎沸，一般好事者更從而鼓動戰爭，最而當局也發出恢復七七事變前原狀的強硬而正大鮮明的聲明，據當時在南京聽說，陶先生曾屢次痛陳中國不能即戰的理由，竭力阻止戰爭的擴大，「民族失敗主義者」的頭銜也是這時候某部份人送給他的。不論陶先生當時阻止擴大戰爭的理由是對是錯，這種力排眾議，不同流俗的精神，是足令人欽佩的。

中日戰爭終於擴大，而且變成持久，一般人希望除努力支持戰爭外，即轉而期望國際當八一三戰爭後最令人瞻首仰望的國家是蘇聯，可巧中蘇互不侵犯協定成立，中蘇軍事同盟，蘇俄出兵的宣傳就跟着來了。在舉國叫囂，南京危機望援不至的空氣中，陶先生於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漢口「掃蕩報」發表一篇「對蘇俄的熱望和失望」。他指出「當初早沒有熱望的道理，如果當初不熱望，今日也就沒有失望的道理。當初的熱望是不對的，今日的失望是不必的。」對於「不對」及「不必」都詳述種種理由，我們另節述及。這自從這篇文章發表以後，所謂「左派」的宣傳被截穿了，跟着「中國共產黨」的青年動搖了，這篇文章震動了整個文壇及各黨各派。「中國共產黨」還特為這篇文章，製定宣傳大綱，交到共產黨的小組討論。同時敬重陶先生者也向他說：「你這樣的拆共產黨的台，動搖共產黨的基礎，一定召來意外的危害。」陶先生不之顧。

當時在國際上除了熱望蘇聯以外就是希望組成陣綫。組織陣綫的目的在集體安全，鼓吹陣綫論者在希望由集體之力獲得中國的安全。

用意雖不可全非，由於言過其實，宣傳變成了欺騙。陶先生於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民意周刊」第二期發表「集體安全的破壞」，他說明集體安全的運動，由於倡導者英美法俄一面備戰，一面避戰的姿態，已趨於破壞。中國領土與主權的完整受侵害，國際聯盟無力過問，使集體安全向破壞的途中。集體安全破壞以後國際情勢是什麼樣子呢？陶先生指出兩個可能，一是英美法俄由於中國的破壞或行將滅亡，起而重建集體安全運動，一是國際陣綫的完全改造，即是國際新均勢的構成。陶先生於二十七年一月十五日在「掃蕩報」發表「國際新均勢的構成」一文，說明新均勢的構成有三個信號，一是蘇俄不參戰，二是英美與蘇俄不合作，三是英德與英義的妥協。這三個事實。指出：一方面集體安全在破壞，一方面反共陣綫在動搖，英美法德義俄，正製造新的勢力均衡的局面。各國走向新均勢的動向，結果是一個和局，不是一個戰局。國際和，中日戰，中國的外交改革應該轉和局為戰局，國際新均勢的建立有待中國抗戰之支持與促成。自這篇文章發表後，「陣綫論」與「新均勢論」成了國際問題研究中的兩大營壘。有些人故造名詞，說反對「陣綫論」者為「新均勢派」，又因為揭破「陣綫論」的欺騙內容的文字多是登載「政論」旬刊，於是國際問題的爭論中，有所謂「政論派」及「政論派的修正派」，這些名詞，不僅見諸語言，而且形諸文字，翻開戰時出版的有關文化活動的報紙雜誌，就可看到這種分析。

二十七年二月間德奧問題發生，英義談判開始，有些人反對英國與義大利妥協，希望英義談判失敗，咒罵英國向義國屈服。陶先生便推測英義談判可以成功，而且希望英義談判成功。為什麼希望成功呢？因為「太平洋的問題，解決的關鍵是英美的合作，英國有力量到太平洋上來與美國合作以對抗日本，必從英國的地中海問題得到相當的解決，中國應當希望英義談判成功，不應當希望英義談判失敗」。再就是英國安定歐洲的綏靖計劃是利遠東的，中國人更不應當反對。

及至五月九月兩度的捷克危急，促成歐洲的緊張局面，日俄因張鼓峯事件引起哨兵衝突，有些人便推測歐洲大戰一定起來，日俄戰爭一定擴大，蘇俄是特為援助中國而來。陶先生便指出歐戰不會因捷克問題發生，日俄的張鼓峯事件不會擴大成大戰爭。事實證明還是後者的推測正確。

以上三者全是陶先生在國際問題上劃時代的著作，使反對者也無言可對。同是中國人，同論一種事，為什麼結論不同呢？這是由於研究國際問題的眼光與立場有所不同。陶先生在「歐洲均勢與太平洋問題」的自序上說明中國人對國際形勢應有的看法「第一個立場，是愛國的立場」，「第二個立場，是抗日的立場」，「第三個立場，是愛自主不偏不倚的立場」，「第四個立場，是民族國家屬於一切的立場」。並說明如果應用這四個立場來研究國際情勢，定可獲得客觀正確的結論，以之傳達於國人，是有益抗戰的，反之或以希望當做事實，或以幻想引起大家的樂觀，都是有害國家的。陶先生並指明不正確的國際情勢的論斷，是歷實的辦法，非單即雙，歷實者順手一壓，那有正確的道理？他又說國際陣綫論者「總把列強看做兒童的玩具，兩邊的陣勢一擺，就可以打個落花流水」。於是從此在文化界流傳的有所謂「國際玩具論」的術語，是專送給某部份閉着眼睛，叫喊陣綫論的人們。

上述的是關於國際問題的卓越見解，關於國內問題還有三篇重要的論文，而成為一般人立論的準繩，一是關於民主政治，一是關於義勇軍，一是關於抗戰建國綱領。

抗戰發生後，一般藉抗戰擴張份人的黨派勢力者，對外高調抗戰，對內要求割據式的民主。陶先生提出「外求獨立，內求統一」的口號，在統一之下實行民主，民主不是地方割據，民主不是政治分裂。有些人在民主的掩護下，強調其黨派利益，陶先生便提出「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的口號以糾正之。有些人專替別國傳話，專替別國作打算，陶先生便提出「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以喚醒那些以蘇俄為祖國的中國人，及那些不為保護國家民族生存而意圖漁利的某些人。更有些惟恐不亂之徒，拿抗戰當做了目的，想無底的打下去，而且想趁戰時毀滅十數年來國家建設的一切，陶先生便提出「一面抗戰，一面建國」的口號來指導抗戰的行動，陳獨秀先生也說近來新發現「抗

戰建國」這一名詞，可以說是深思遠慮的了。陶先生提出也或者歸納而成的這八個口號，成了戰時一切行動的綱領。

南京陷落後，正規軍大多潰散了，某些人高唱義勇軍，游擊戰，自以為有了義勇軍實行游擊戰，失地即可盡復，日兵即要退走。影響所及將使國人疏忽建軍工作，將使地方無有才遺。陶先生於二十七年一月發表「義勇軍的歷史教訓」一文，糾正一般人的錯誤。他在這篇文章中說明一、義勇軍的集合方法，二、發展的危機，三、義勇軍在全面戰爭中的價值。在第三點中，陶先生指出在農村已不能自給自足的現在，義勇軍不容易聚眾自保，再就是從前是刀槍弓箭容易補充，現在是飛機坦克，無法自造。陶先生的論文發表後，文化界發生所謂「打游擊」運動，即是打擊狂吹「游擊戰」之宣傳者。「打游擊」的論文，後來集成兩本小書，名為論「游擊戰」。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關於「抗戰建國綱領」的闡釋。誰也知道「抗戰建國綱領」是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製定，共產黨說它是一黨的產物，主張召開各黨各派聯席會議，重新製各黨派共同遵守厲行的綱領。陶先生針對這種邪說於二十七年五月發表「抗戰建國綱領的性質與精神」，從法律觀點說明綱領是全國性的，不是一黨的，更從政治觀點，說明國民黨的興亡就是中國的國家的興亡，更接着解釋綱領的內容與要點，這篇文章普遍載國內各報紙雜誌，共產黨的負責人看到，說它是「一篇利害文章」。從此以後視抗戰建國綱領為一黨的歪曲宣傳再不見於文字了。七月間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開會，抗戰建國綱領又經過參政會全體一致通過接受，綱領的全國性的地位益加確定。

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上曾提出道德與科學並重！及二十七年八月藝文研究會遷到重慶，周佛海先生與陶希聖先生主持的宣傳工作，即是提倡科學，以科學精神打擊欺騙的幻想，陶先生會有多篇文字發表於各報。

還有一個傳言說劃時代的中國國民黨全國臨時代表大會宣言的初稿是陶先生起草的，後由汪先生加以修改。假使看過藝文研究會工作綱領（定名最高原則）的人，就可以知道這個傳言，並非虛構。由這些簡單的敘述可以確定陶先生在戰時的文化工作上的領導地位，這是任何人均無法否認的。至於各種問題的較評論述留在後節。

（未完）

史太林的最後目標

燕妮譯

直到現在止，希特勒是外交賭場中最活躍的賭客。他可以使天公降雨或出太陽。他能使其敵人迷惑，使其友人被遺棄，在同盟的口號下，他屈服了羅馬，馬德里，東京，布達佩斯與索非亞。總之，他是歐洲惟一活躍的人。

現在，他與史大林結盟起來，儘管他依然認為自己是世界的主宰，他却遇到了對手。不久，史大林將勝過他，且終於要遺棄他。無疑的，無論對於沙皇的俄國或共黨的俄國，大德國總是俄國的真正敵人。

爲要完成他的傑作，希特勒遺棄了他會藉以擴張德國的「意識」。現在，「過激主義」與「反共產主義」，變成了什麼呢？顯然的，這些觀念，只不過是政治或外交策略。在另一方面，無論我們贊同與否，共產主義已逐漸顯示其重量。

在莫斯科，幾月來，信差即兩度敲過那住着共產黨國外活動機關的巨廈的大門。莫斯科的外國外交家，便愚笨到極點的認爲——且告知各該國政府——克里姆宮已放棄世界共產主義的理想，而採用俄國民族主義。德蘇協定，只是一個先聲，已證明史大林仍然堅持其路線，或許不是使共產主義成爲普遍的，不過至少也要先建樹起他在希特勒的「新秩序」出現時可顯指氣使的地位。還有，史大林藉此，終止了那常是俄國的危險的反共公約。

慕尼黑會議後，許多法國報紙都埋怨法國沒有與蘇俄聯合起來打

倒希特勒，不過同時他們又希望當危機一行過去，他們即與敵人聯合起來，打倒莫斯科的共產主義。史大林恐怕在戰爭結束後，或在戰爭中，友敵聯合起來反對克里姆宮，是很對的。里賓特羅甫到莫斯科的旅行，使這種可能消失了。在任何國家中，共產主義都在凋零中，或者至少，他的教條已因各方的磨煉而失其效力。例如在巴黎，共產黨員參加最時髦的宴會。並且在李特維諾夫與其「和平不可分」，「集體安全」政策影響下，一切共產黨員，在希特勒威脅之下，在對內政策上，不僅變成愛國者，且變成保守的了。

今年三月，是各國聯合反對希特勒的開始，他方看到他在「我的奮鬥」一書中提出的計劃的實現，已被要與民主國家作戰的危險與不能使波蘭與其民主國同盟分離一事破壞了。

對蘇聯盟，幾乎使希特勒可以實現他獨霸歐洲的夢想，因爲他使英法無法保衛波蘭，並且即使成功，六個月後，他們也要保衛自己的首都了。無疑的，克里姆宮的目的，在挑撥資本主義國家戰爭，而自已旁觀。

無論大家怎樣說，俄國却宣布在「戰爭初幾月中」保守中立。聯帶的，德蘇協定，又給予俄國以廣泛的仲裁權力，特別因爲他可以幫助一方獲勝。在巴黎，波蘭方面曾認爲假如蘇俄供給德國以原料，他也可供給波蘭以機關鎗與飛機，歐洲外交家都確認史大林未必特別使希特勒勝利，儘管後者已提貢了半個波蘭。因爲最後，史大林在歐洲

的眞正敵人，還是希特勒。

張伯倫與達第知道史大林所要求的，是在和平實現時，他仍在富有資源與財庫豐盈的國家的寶座上。史大林相信如果這一天出現，他就可以任意提出條件，推行共產主義於全世界。

顯然的，史大林沒有希特勒那樣富於創意，所以我們要等些時候，方能看到這幕大戰。不過，現在我們已然看到報紙上墨索里尼與希特勒所說的「納粹，法西斯與共產主義意識的融合了」，這種融合似將延續到相當時間。例如八月廿六日，Popolo D'Italia寫道，「這三種意識，有這樣的相同點，他們都反對資產階級，財閥政治與民主政治」。

法國佛蘭亭曾於八月廿五日對達第內閣某閣員說：「自此，全能國家開始結合起來。這樣，使世事簡單許多，因為民主國家可以知道他們面對着什麼，因此他們也能聯合起來爲生存而奮鬥。這是自由與被統治之間的鬥爭」。

佛蘭亭有一部份說對了：不過值得懷疑的是史大林究竟是否要永久與德國結合，假如永久結合，則他是幫助一個將要侵蝕俄國領土的德國了。因此，他挑選他的大敵，希特勒與民主國家作戰，使之筋疲力盡，在最後的時光中，史大林易於插上手把他結果了。許多德國官吏久已看到將來史大林會遺棄德國的。

八月廿四日，希特勒命令戈培爾研究德國官吏對於德蘇協定的反應，並發布命令：如無希特勒代表出席且在官式集會中，不准討論第三帝國的政治轉變。德國官吏，特別是戈林派到西班牙去的最高統帥，（如VON GONAU）公然批評希特勒已然發動許多「很可疑的」新軍事

措施。在他們眼中，德國已有失去其新近的盟友，陷於孤立，且與史大林正面摩擦的危險。他們認爲希特勒的決定，已促使世界戰爭要爆發，他們也無法確知戰爭如果爆發，史大林是否立即行動。他們的話，引起希特勒的注意，於是立即打電話與墨索里尼，教他向佛朗哥提出良的美敦書，要求割讓巴利阿利克羣島與軸心國，作爲其忠實的保證，否前，德意將襲擊馬約加與米諾加。墨索里尼派在西班牙的軍事全權代表，告訴戈林，在他眼中，佛朗哥對於共產主義與非共產主義之結合，極爲憤怒，他想轉向民主國家。還有，日本也沒有停止他的抗議，英日新同盟，也是很可能的；封鎖香港，已成過去的了。至於匈牙利，南斯拉夫與布加利亞，他們都掙扎着要脫離希特勒的羈絆。

很可能的，在空前的戰爭以後，民主國家要損失其無數青年，而希特勒也將更加投到史大林懷中；史大林對他，也將如希特勒之對墨索里尼。史大林終於也將放棄他以保證蘇聯之實際安全與推進其自己的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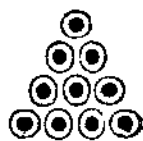
在法國，許多人認爲在終局時，民主國家要與史大林在會場上討論事項，那時候，他們將被迫爲那被希特勒之狂怒與史大林之教條意志使之疲敝的世界，尋求某種和平。

在巴黎，儘管在這緊張時期，人們還有許多幽默與諷。八月廿六日，有人說：「這次墨索里尼報仇了，現在是希特勒要作二把手了。」

Genevieve Tabouis作

譯自 The New Republic Sept 20

X X X X X



國內外一週大事述評

(二十八年十月十四日至二十日)

國內

在述評中，曾屢次說到汪先生領導的和平運動，是有固定主張與遠大目的的。我們不問成功的快慢，只問和平的條件，是否足以達到我們致力和平的目的。我們既不求急功，也不玩弄和平。玩弄和平是重慶政府的把戲；急求速效，只是爲個人升官發財作打算的把戲，若爲保持國家民族的生存，便不能這樣。現在重慶仍在那裏以抗戰作幌子，玩弄和平，我們則堅苦致力於復黨建國的運動，我們的運動是想於戰爭之中求和平，戰敗之後謀建設，任重事繁，決非一蹴可致的。

本月十七日各報發表周佛海先生在東京對日記者團的談話，使我們知道和平運動目下又進了一步，周先生對新中央政府的組織時間，有鮮明的表示，他說「要加強人的方面，物的方面之基礎而組成政府，必須有周到之準備」。大概中央政府的組織，現在仍在準備中，所謂準備，一是等待和平目的之部份實現，一是準備組成政府之「人」與「物」的基礎。談到和平目的與組織政府的關係，本月十七日中華日報社評「和平運動之目的與手段」有正確而堅決的說明，該社評首先指出「和平運動目的之一在於寢息兵戎，恢復安定」。

「和平運動的目的之二，在於澈底解決中日之間的各種問題」。和平運動的目的之三，在於以中日兩國共存爲基點以奠定東亞永久和平」。

「和平運動的目的是這樣的切實，這樣的艱辛，這樣的遼遠。在和平運動到達的途中，決沒有苟安的隙地，也沒有止息的階梯。或者有人以爲我們和平運動的目的在於成立中央政府。或者

認定中央政府的成立是和平運動中的一個止息的階梯，一個苟安的隙地。我們要鄭重告訴他們，這種認識是錯誤的。組織政府，不過是實現和平目的的手段，組織政府並不是和平運動的目的。若說是組成政府就是和平目的之實現，重慶政府仍在而無力實現和平，南北兩地方政府早已成立，而和平仍不能實現。我們組織政府，不是設立一個號令不出部門的衙門就算完事，我們組織政府，是與復國俱來的。再明白一點說：組府只是爲了復國。國沒有復，政府又從何有權？與其在種種限制下成立政府，還是在野之身，作復黨救國的和平運動，較爲與國家民族有利些。我們的政府，只有受全國民衆的支持與監督，我們政府的政策是由中國國民黨適應民衆的要求，國家的需要，來決定，然後以全國民衆擁護的政府，實行中國國民黨依照民衆要求國家需要決定的政策，和平運動的遠大目的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實現，和平運動的艱巨工作才可以一棒一棒的做起。因此，組織政府不過是和平工作的一部份，和平運動的一階段。政府組成以後不過使和平的目的更容易實現，和平的工作更易於促進而已。所以在政府組織以前，「要準備人事的條件，要充實實力的基礎，要取得獨立自主的地位」。在政府組成以後，更有和平的恢復，國交的調整，經濟問題的解決，各種各樣的重大任務，千頭萬緒的艱難事業」。這組府前後的這些工作，都是我們致力和平運動者的責任，大家不要太樂觀了，以爲政府組成以後，一切可以馬上有辦法。同時也不要悲觀，人力可以勝天，只要我們肯努力去做，定可克復一切艱難，實現我們的和平的目的。國亡者，尙可由志士之努力而恢復，何況我們尙是有國可恃的人民呢？中華日報的社論說的好，「我們要堅確認定組府不是最高的目標。我們要懷抱並堅定我們在野的精神」。

我們的大好國家，已淪陷半壁，最近西北又傳警訊。前些天就傳說蘇聯的軍隊要開入新疆，最近又傳說蘇聯向重慶政府提出「嚴重要求」。

一、要求蘇聯在內蒙與新疆廣大區域中之駐兵權，二、要求中國西北部之「蘇維埃化」，並說蘇聯以開兵入西北各省相恫嚇，實現其要求。事實果如所傳，中國又要受到前後夾擊之禍了。蘇聯與德國合手，波蘭遂重遭瓜分，蘇聯若在遠東與日本協手，中國自是它瓜分的對像，在史大林支配下之反動政權，此種事是極易為之的。我們早就說過，反動的蘇聯不會援助中國抗戰，目下蘇聯更進一步不僅不援助，還要落井下石，求取漁人之利了。同胞們，緊提防這隻赤色的野狼。

國際

歐戰到了打既不可，和又不能的地步。希特勒固然希望和，英法也是不想打仗。

打仗的對手，一是英法，一是德國，都不想擴大戰爭，只有和了，可是和又不可。目下的局面是停戰而不言和，因為和平的條件難講。希特勒願意講和，解決殖民地問題是他言和的條件。英法願意講和，獲得德國的確實保證是他們言和的條件。德國吞併奧捷，佔有波蘭以後已成了一隻猛虎，再恢復昔日的殖民地，真如虎輔翼，英法皆非其敵手。英法要確實保證，意在不相信現在的國社黨政府，要打倒希特勒政權，另換使英法可以相信的政府，這在國社黨看起來，簡直是一種侮辱，無怪德外長李賓特洛夫以毀滅大英帝國的談話相答復了。英法或有趁此機會，一棒打殺希特勒的打算，所以不敢即行者，因為自己的陣勢沒有佈好。所以英法不能即行攻擊德國，也不能立時謀和平。希特勒何嘗沒有毀滅大英帝國的雄心，只是自己的力量不夠，也正在那裏佈置。所以德國不即行反攻，也不能迅速獲得和平。在英法與德國相持之下，好了蘇聯，蘇聯正在波羅的海及巴爾幹一帶趁火搶劫。這一點使英法德均觸目而寒心，未來的修戰言和，這是一股促進的力量。

史大林正在向芬蘭施壓力，芬蘭一方面與蘇聯外交談判，一方面動員軍隊，準備抵抗侵略。蘇聯與芬蘭在莫斯科的談判，蘇聯方面是獨裁者史大林親自出席，談判的內容是要求芬蘭締結軍事同盟，成立政治與經濟連繫，割讓芬蘭灣中的各島。斯堪的那維亞各國看到芬蘭的窘狀，物傷其類，丹麥、瑞典、挪威三國均照會蘇聯，討點人情，希望不要過於損害芬蘭的獨立。蘇芬兩國於十四日完成初步談判，芬蘭代表團返國聆訓，據傳芬蘭可以接受蘇聯的要求，蘇芬談判日內可以重開。蘇聯在巴爾幹一帶的活動漸引起義大利的不滿，這是最使希特勒左右做人難的問題。義大利原欲在巴爾幹一帶佔據優勢，讓德蘇在東北歐一帶活動。史大林的野心太大，魔手已伸到波羅的海，還不夠，又向巴爾幹半島插足，義大利不滿。而且義大利對蘇的不滿，遷及德國。報載義大利正依照德義政治軍事協定向德國交涉，義國願在精神上援助德國抗英法，但須德國也勸蘇聯不向多瑙河流域與巴爾幹半島擴張勢力。義大利的反對，足可以使蘇聯縮回魔手，因為德蘇均需要義大利的中立與協助。

英蘇均拉籠土耳其，土耳其是門開兩扇，一方與英國談判，一方與蘇聯交涉，英土的談判成功，蘇土的談判自然失敗。

英土這一次談判還有法國參加，英法土三國互助談判已於本月十九日在土耳其京城安哥拉亮子。三國的互助談判，進行已有半年，英土兩國曾於本年五月十二日會同發表宣言，聲明雙方業已樹立聯繫。法土兩國亦於六月二十三日發表同樣宣言。由此更進一步開始互助談判，因土耳其在英法與蘇聯之間左右逢源，擇其有利者而從之，遷延至今英法土的互助談判算是成功了。據傳條件：(一)在東地中海方面採取自動性之互助。(二)英法為履行其對羅馬尼亞、希臘之義務時，土耳其得贊助之。(三)關於巴爾幹事件，由三國進行協商。

北歐四國——瑞典、挪威、丹麥、芬蘭於本月十八日在瑞典京城舉行會議，目的在加強四國聯繫，抗拒外來侵略。四國元首均親自出席，會議的結果，四國嚴守中立政策，經濟上互相援助，並有調停法德戰爭之意。